

## 文学现场

# 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到现在

——以《传统的踪迹》为个案的圆桌论坛（节录）

王尧 高远东 郭娟 栾梅健 罗岗 房伟 张蕾等

**摘要：**文化传承发展是当前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议题。就文学研究而言，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如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与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2024年9月28日，苏州大学召开了“从传统到现在：中国文学研究圆桌论坛”，以《传统的踪迹：古典章回小说的现代承继》一书为个案，就相关学术问题展开了对话与交流。

**关键词：**《传统的踪迹》；传统；中国文学；通俗文学

### 一、“传统的发明”

王尧（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在这个学科文化变革的时代，“中文系”这一名称显得格外优雅和崇高。此次活动由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苏州大学人文社科处和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围绕青年学者张蕾教授的著作《传统的踪迹：古典章回小说的现代承继》进行深入讨论。

诗、文研究之外，通俗文学也是苏大文学院研究的重要领域。在通俗文学研究方面，我们学院后继有人。张蕾教授的著作展现了代际融合的趋势，不再将“雅”与“俗”对立。在过去，这两者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而如今，随着网络文学的崛起，房伟老师、刘阳扬老师、臧晴老师也

在积极开展相关研究，通俗文学研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陕西省的《延河》杂志提出了“新大众文艺”的框架，这也为我们重新讨论相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我们以张蕾的新书为个案展开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的讨论围绕张蕾教授最新学术成果《传统的踪迹：古典章回小说的现代承继》来谈。我认为，这本书是我们近期在中国近现代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新启示，是一部成熟而优秀的学术著作，作为讨论的中心选题非常恰当，其学术影响力也非常大。

首先，这本书展现了良好的学术气象，避免了当今许多年轻学者常见的通病。许多年轻学者往往专注于技术层面的问题，缺乏宏观价值

和大的学术视野。相比之下,张蕾的书大气且视野开阔,所探讨的问题十分深刻,没有虚浮的内容,是基于材料和自身的心得展开论述。张蕾的研究广泛地思考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强调这一议题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非常重要。近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密切,但与传统文学的联系似乎不够明显。张蕾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创新,展开新的课题,特别是在探讨现代文学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时,从一种文类内部的考察中取得了很好的突破。她的著作不仅避免了技术主义所导致的视野狭隘问题,还在比较研究中找到了历史的深层联系,将文学创作与文学生产的各个层面紧密结合。

其次,该书很好地贯通了雅俗关系。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张蕾的研究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应遵循的规范,同时也打破了雅俗的界限。新一代研究者往往没有那么多学术教条和成规,张蕾的研究关注问题本身,突出了问题意识,关注文史的互动与互证。

此外,张蕾的研究还展现了新旧文学的融合,尤其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对当时那些未能成功的反对意见也给予了肯定。她的研究认识到文与史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她对古典章回小说延伸至现代的脉络梳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揭示了许多一般小说研究中难以触及的深层内容。她采用历史寻踪的比较方法,体现出宽广的文学史视野,为新旧文学研究开辟了新局面。

郭娟(《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每次来到苏州大学,我都感到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过去,新文学是主流,通俗文学的地位并不高。然而,工作中的新想法和参加的多次会议使我对通俗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重新回到新文学的现场,我发现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之间是有融合的。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关注新文学,而忽视了通俗文学的重要性。在编辑《新文学史料》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不同学校的学术风气和来稿质量,因此在心中对苏州大学的学者有了基本的判断,对他们深感敬佩。新文学和旧文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新文学史料》中,通俗文学的史料占比并不多,因此我们更加重视优中选优,而许多优秀的通俗文学稿件正是来自苏州大学。我很荣幸拜读了

张蕾老师的著作,其作品内容厚重,展现出宏大的气象;论题广泛,史料丰富且扎实;阐释明晰,既具备古今中外的宏观视野,又严格遵循学术理路与规范。张老师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承继学术传统,既承上启下,又在前人提及或未提及的问题上不断推进研究,避免了盲目无效的探索,这实属难能可贵。

曾有一段时间,学界将传统的断裂归结为“五四”运动。实际上,鲁迅、胡适、郑振铎甚至学衡派都从传统中汲取了养分。每一代人都需要回顾传统进行批判与整合,而“五四”运动正是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对传统进行筛选,这既是利用也是一种新生。当今,文化和思想界正面对着重要的思想潮流,张老师的研究在回答一些重要问题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传统的踪迹”这一探寻钩连“草蛇灰线”的论题,无论是借鉴革新还是继承改良,张老师都通过大量史料进行了充分地阐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展现了她的学术深度与功力。汪曾祺的作品中蕴含着旧文化和对旧社会的描述,他的小说有许多写法、情感与传统小说相通,显然受到了传统小说的影响。希望张蕾老师也能就哪些传统小说作品对汪曾祺创作产生影响展开相关研究,将研究延伸到当代文学领域。

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刚才王尧教授和刘祥安教授都提到了范伯群先生在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俗文学的研究受到不少歧视。范伯群老师在申请博士生导师时,不得不撤掉许多与通俗文学相关的材料,这令人非常遗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偏见有所减弱,文化愈加多元开放,逐渐变得更加包容。范伯群先生的努力带来了丰硕成果,使大家相信近现代通俗文学确实是这一时期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近现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是“比翼双飞”的关系。正是在范先生的努力下,我们的学科得以进步。比如《海上花列传》和周瘦鹃的爱国小说都是在通俗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表现,等等,这些观点都值得重视。张蕾老师的研究扎实认真,她不仅深化了范伯群老师的研究,还打通了古今,拓展了通俗文学的研究领域,使之更加融会贯通,并且深入探讨了通俗文

学的价值。

对传统的重新发现,不仅需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衍生,还需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树立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意识。例如,有的研究者在考察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时,习惯将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视为唯一影响莫言的外国作家,但作为中国作家的莫言,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可能仅仅源于一位外国作家。在考察中国作家与中外文学关系的问题上,或者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与传统是居于主体地位的。马尔克斯的作品在莫言的创作中起到了参与作用,而非单一的来源。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梳理中国传统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的衍生,我们必须有文化自信,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我期待张蕾老师不仅能够比较这八部小说,还能够深入梳理当代许多严肃文学中的传统文化问题。我们应实现文化研究上的创造性转化,推动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我希望苏州大学能够抓住机会,进行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都应当纳入这一研究体系中。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传统到现在”这个题目非常好,我就围绕这个主题谈两点。第一,关于“传统的发明”。章回体小说被视为传统文学,但正如高远东老师所言,古代文学研究其实是现代的“发明”,完全是“五四”新文学建构的结果。在新文学的讨论中,周作人追溯了诗文传统,而小说,尤其是章回体小说地位的提升,正与“五四”新文学的构建息息相关。这一方面反映为小说史研究,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白话文的改观。章回体小说实现了言文合一。现代文学受制于印刷文化,它是一种阅读文学,而非听觉文学。在这一背景下,章回体小说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既可以说传统影响了小说,也可以说现代小说发扬了传统小说的影响。“传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是被当代和现代所重新发明的。早期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常常是一些固定的元素。谈论谁影响谁时,总有主体和被影响者,比如莫言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但反过来说,莫言的小说也是魔幻现实主义全球旅行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莫言的贡献,马尔克斯的伟大或许也会有所不同。“全球旅行”强调的并不是单纯的影响关系,误读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种创造。张蕾的研究对象同样涉及对传统的误读和创新。如今广义的翻译不仅限于语言层面,甚至传统文学可以被“翻译”为小说,这种接受主体的变化打开了新的空间,恰与对传统的发明相关。

第二,与现代的关系,关于“经典的宇宙”。在西方电影中,我们看到“漫威宇宙”;在二次元文化中,有“西游宇宙”和“封神宇宙”;网络文学中的数据库也使经典成为取材的源头,催生了同人写作。这些重新定义了雅俗问题,过去的雅俗是有固定秩序的,而在互联网文化兴起后,这一秩序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跨媒体的创造。最近,白惠元的《英雄变格》探讨了《西游记》的创新性发展。现在的“封神宇宙”与《封神演义》的关系已经不再密切。张蕾老师的书正好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新变。在当代,“新文学”的传统受到了挑战,网络文学的兴起也是对通俗文学的冲击。经典文学在此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四大名著及明清的章回体小说最初被视为“俗”,而如今则被重新定义为“雅”。这些作品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尤其是在二次元文化的推动下,围绕“封神演义”衍生出的哪吒故事、杨戬故事,以及各种赛博朋克和穿越故事结合在一起,使得经典焕发新生。如果依然按照原小说进行改编,是不可能取得今日的影响力和活力的。张蕾老师的书也应被视作经典的新变,这些经典应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事物相结合,如何实现这一结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二、“伟大的传统”

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觉得张老师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小说史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问题。这个大传统就是在谈大的传统文学对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通俗文学的影响。北大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北大的王瑶先生有一篇论著谈古典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经典的文献。张老师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提到了这篇文献。后面有方锡德先生在做中国小说与中国文

学传统研究的一本专著,我也学习过这本专著,写得非常好。可以看到,两位先生更多谈到的是大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陈平原老师在关于中国小说叙事转变的研究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中国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的关系,是叔侄继承的关系,而不是父子相继。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受到西方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的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影响,而中国传统的通俗小说脉络是有所缺失的。古典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特别是章回小说,在现代之后怎样产生变化?怎样影响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内在构成?我觉得这是被大家忽视的一点。新时期以来,在形成一个雅俗对立的研究格局的时候,研究通俗文学更多地强调通俗的影响,张蕾老师的著作在大的古典文学传统和小的章回文学传统脉络中,在大传统、小传统与现代文学的承继关系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系统且具有创建性的研究,这使人振奋欣喜,值得学习。

再来谈谈创新性的问题。张蕾老师谈问题,不是简单谈这些小说中有哪些章回小说的元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代与传统交融共生,复杂丰富,科学合理,更有说服力。在学习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张老师谈到了从演义到历史小说概念的变化。她提到了德龄的《清宫二年记》,这本书的视角是第一人称的回顾性视角,有非常强的现代特征,这实际上是演义向历史小说过渡的一个变种,这一点是现代文学研究中有所忽略的。因此可以看出张蕾老师有着非常敏锐的学术视野。还有她谈西游传统,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因子,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因子上又有新的生发和变化。《八十一梦》这部作品和当时的抗战时局有关系,对西游故事进行了重新改写,我认为这个改写就是一个传承创新的问题。

现在大家谈网络文学,更看重的是创新性。很多的学者,尤其是文艺学出身的学者,都认为网络文学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产物,受到后现代尤其是数字文化的影响。但是它到了中国本土以后,在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规模的过程中,到底生成了怎样丰富复杂的故事,我觉得很难用一个“后现代”来概括它。比如说很多学者从

后现代的观点出发,认为所谓的网络文学就是要反经典,经典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所谓的文学性,网络性大于文学性。在网络文学研究中,网络文学海量的创作受到传统文学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像中国神魔小说的传统,对玄幻题材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同时也有一些比较间接的影响。但是对这类影响的研究,在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中,还非常小众。

我认为张蕾老师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打通雅俗、打通传统与现代的窗口,也就是说,在当下文化更加融合发展的背景之下,怎样来谈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张老师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一方面,她让我们重新认识原来被忽视的文本;另一方面,在文本研究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潜在的影响。比方说,现在很火的《西游八十一案》,把81难写成81个侦破的案件,这也是西游传统的变种,这在当代和现代的研究领域都没有被关注到,大家看到创新的部分,没有重视其中传统的血脉。如何在我们的研究中梳理出传统的踪迹,总结出特点和规律,进而丰富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建构,张蕾老师的开创性工作非常有价值,非常期待她在未来能产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陈浩文(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我首先注意到两个关键词:“伟大的传统”和“影响的焦虑”。这两个关键词被张蕾老师用来概括现代通俗小说的基本形态,也可以看作她基本的写作背景,这也是张老师对大文学史观的回应。她借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踪迹”的概念探讨现代通俗小说对传统的继承和改写,我认为这是在文本的关系主义里描绘传统是怎样在现代通俗小说中生成现代性的。我个人觉得这种理论立场,实际上也可以借用鲁迅的“历史中间物”的概念给现代通俗小说进行定位。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形态的现代通俗小说,不仅仅是对传统的一种单纯的接受,也不仅仅是对近代以来新型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一种简单反映,而是成了一种显现传统和现代动态关系的中介。我想这在方法上已经拓宽了以往现代通俗小说研究的边界。这本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问题,考察现代小说对古代小说传统的继

承和改良,是在一些学者谈变的基础上对不变的那一部分进行延伸,并且讨论现代通俗小说是怎么样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发扬《红楼梦》《水浒传》这些古典小说的伟大传统,以及生成现代性特征。

我发现张老师书中很多处引用了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将两书进行对比阅读,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细节。在第四章中,张老师深入探讨了《金瓶梅》对狎邪小说、谴责小说及黑幕小说的影响,巧妙引入了“陆沉”与“狂欢”的概念。王德威对这三类小说持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关注狎邪小说的身体政治与欲望化叙事如何开启新篇章,以及谴责小说从价值论角度对狂欢现象的剖析。张老师则进一步将晚清各类小说与《金瓶梅》相联系,这或可视为对王德威观点的一种独特解读与拓展。然而,当“狂欢”被纳入《金瓶梅》的传统框架内,若该传统本身就蕴含着对一切价值的解构与狂欢,那么在此传统影响下的狎邪、谴责、黑幕小说,又在何种程度上能被赋予“现代”的标签?反之,若将《金瓶梅》所开创的“陆沉”与“狂欢”视为现代性的象征,那么传统的界限又该如何界定?在阅读此章节时,我深感张老师提出的“真”的概念,相较于“陆沉”与“狂欢”的暧昧性,更能凸显现代通俗小说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独特属性。张老师援引学者观点,指出《金瓶梅》的“真”视角具备现代意义,但我个人认为,《金瓶梅》之“真”更多地根植于色空观念之下。姚灵犀对《金瓶梅》色欲描写的正视及其长篇小说《瑶光秘记》的创作,实则是对该传统之“真”的重新诠释与现代化改造,他将宗教与哲学层面的色空观念历史化、科学化、理性化,同时在其作品中细腻描绘青年男女的情欲纠葛,流露出忏悔与抑郁之情,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五四”时期关于青年性压抑问题的广泛讨论与文学创作。进而思考,若欲深入探讨“五四”时期青年性压抑问题与国家意识的内在联系,或许能从这一时期通俗小说作家对《金瓶梅》的研究中寻得传统脉络与启示。

在回顾全书章节布局时,我愈发体会到张老师的写作匠心。她巧妙运用《红楼梦》与《水浒传》的传统,勾勒出传统章回小说与现代通

俗小说之间的微妙关联,此举或旨在避免落入本质主义命名的窠臼。此外,从章节衔接来看,张老师依据古典小说的刊印时间进行排序,而非围绕某个或几个核心文本展开讨论,这种处理方式更显客观与全面。

谈完传统问题,再谈谈现代通俗小说的现代性生成的问题。面对现代性生成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布鲁姆(Harold Bloom)。张老师在引用布鲁姆的观点的时候,强调现代通俗小说作家们面对《红楼梦》和《水浒传》的传统,究竟是采取抗拒还是接受,怎样去利用传统来进行自身创作的问题。在布鲁姆的影响焦虑里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强力诗人的自我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这可能意味着一种失败的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对抗,是不惜与前驱展开竞争角力到底的,对前驱是一种积极地占用,如果从新文学作家自身来审视的话,我想也许会更明显一些。比如说张老师在结语部分提到的巴金,巴金对《红楼梦》的改写和创造性转化,实际上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学非常核心的精神气质。但是论起张恨水,张老师的着眼点主要是放在他对小说文体的积极变革上,对于小说文本所显示的现代性,好像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时代反应。所以我有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现代通俗小说,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跟传统形成了一种自觉的主体间竞争,而不是依靠虚构的先在权威,向后来者作出顺势转换?

赵晨(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展现了阅读和书写的可能性,这里面的每个文本都是大部头,都具有很重要的界标意义。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跟我们讲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张蕾老师跟我们讲的其实是阅读不能承受之重,每一本书阅读起来是困难的,理解起来也是困难的,张蕾老师写下来更是一个困难加困难的事情。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写过一本小说叫作《斯通纳》,斯通纳不仅是这本小说的名字,也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个非常怪诞的故事。斯通纳的一生包括出生、读书、教书、死亡,没有什么人记得他,唯一让这个名字留下来的其实就是阅读。所以我想这个也是

张蕾老师写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阅读能够发出的光亮究竟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从传统到现在的,这个是第一个令我很感动的地方。

第二,我们的会议名字是“从传统到现在”,这个句式“从什么到什么”,是暗含起源意义的。早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那里,我们就有一个关于起源的范本,就是《利维坦》。利维坦最早是基督教神话里面的海洋巨兽,在中世纪常常被神学院和哲学院视为混乱无序的隐喻,但是在霍布斯那里,他认为混乱能够将原本的混乱消解在自身之中。为什么要提《利维坦》呢?因为那天我翻到一张插图,是1651年第一版《利维坦》出版之后的扉页插图。那张图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用霍布斯的话来讲就是大众,大众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利维坦的身体,这个汇聚而成的身体横穿国家大地。这张图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就是一个代表着公共体政治秩序的公共人格,在汇集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个肉身的、在场的人格。我觉得这张图很巧妙地呼应了《利维坦》的副标题“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但是反过来想,这种由多个人组建起来的肉身构成利维坦的形式,用张蕾老师的话讲就是“集缀”。

为什么要提“集缀”呢?因为“集缀”是张蕾老师博士论文的起点,这一直都是张老师的关键词。在一个学者的研究论述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她的写作的变化,也就是传统。说到传统,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传统。因为这次会议是在苏大办的,所以首先它肯定是范伯群老师的大文学史传统,张蕾老师作为范老师的高徒,我觉得这个是学生对老师那种很美妙的、遥远的回应。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只有在苏州才能开,也只有苏州的人才能写出这本书来,这就是地方性精神的大旗高高举起。另一个我觉得有章可循的传统,就是方锡德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写的就是重新审视传统,所以我觉得这是张蕾老师对自己老师的继承,方锡德老师的这本论著也是理解张蕾老师著作的一个切口。

除去张蕾老师的个人经历之外,这本书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创作,我们还是要从更多的公共的知识系统来框定。张老师在书的第20页

标注了“传统”来源于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她也讲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但实际上我觉得从实际的书写操作层面来讲,这本书呼应的还是鲁迅,第一个当然就是《中国小说史略》。张蕾老师的篇幅设计把《三国演义》放在第一章,就是在回应《中国小说史略》的史传传统。除了《中国小说史略》,张蕾老师这本书还呼应了《小说旧闻钞》。这两部作品共同组建了鲁迅的中国小说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里面很大一部分材料就是长篇章回,章回也正是张蕾老师的一个研究重点。在这种体系的构建下,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史论、史料、文本三位一体的研究路数。《小说旧闻钞》有三十八种小说史料,题材非常广泛,数量也非常惊人。张蕾老师的书也具备非常翔实的史料,可谓句句有出处,也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史料,才能展现出传统的踪迹。这本书的构建有一点类似作家作品论,作家作品论的文学本位观其实存在一个界限,就是重文学而轻历史。但是史料恰好就展现出了文学变革延伸发展的维度和创作可能的轨迹。

这本书由八部古典章回小说构成,我觉得八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但丁(Dante Alighieri)在《神曲·天堂篇》里面写道,但丁跟贝雅特丽齐从地球上不断向上飞,穿过了八重天,但丁看到天上有一个强烈的光点,贝雅特丽齐对但丁说:“天和整个自然都依靠这一光点”。所以我觉得张蕾老师穿过八部小说,也就是穿过八重天后得到这样一个境界。

还有一点,不是只有张蕾老师这样去研究小说史的,法国的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的《小说鉴史》有个很吓人的副标题叫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她将文学视为法兰西的一个特性,而且她的方式跟张蕾老师一样,她选了九个作家,从福楼拜到斯塔尔夫夫人,一共十三部作品,通过小说加小说来展现19世纪的大变动。还有最近新出的另一本《文学的第三共和国》。所以,小说加小说能不能等于文史混合的新结果,这已经得到多个国家研究者的证明,我觉得这个方法行之有效。

王振(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对于传统文学或者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

我是非常感兴趣以及关注的。我觉得张老师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这个问题意识是跨越学科本身的,在古今维度当中,非常注重传统的承续力量,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话。在探讨文学的古今不同以及古典文学传统的现代继承问题的时候,可以回到如何理解文学的问题上来,也就是“文学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维度的回答,我比较赞同一位学者的说法,就是文学是一场鲜活的交谈,它生发于对话当中,这个对话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空间的,这个对话本身也在不断地生发。张老师的这本书展现出了这种对话的力量,新旧的,雅俗的,体现了一种融合性的研究。

下面我想讲一下怎么理解传统的问题,其实张老师在书中也谈到了,表现在文体、叙事、情感、思想等方面。我这段时间在写一篇文章,探讨关于七月派的诗人绿原以及他晚年的诗歌创作和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关系。他 20 世纪 40 年代肄业于重庆国立复旦大学外文系,曾致力于德语文学的翻译,他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又是一位具有开阔视野的诗人。他在现代诗歌创作当中能够表现出一种古典的意蕴,就是因为他很注重古典诗歌凝练的抒情,以及智性高蹈的精神特质,这其实源于他对新时期文坛一些不良创作现象的发现,也有他在诗歌理性方面的努力。

我想通过这个探讨回应刚才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更大意义上可能不只是获取知识和追溯传统的经验,而是需要从更深层意识到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精神性内容,并对现代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让传统文学和文化在更大意义上获得现代的思想力量,在承续当中被现代所发明。

牛煜(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我在阅读张老师这本书的同时,也在阅读另外一位女性学者——社科院黄梅老师的《奥斯丁问题》,这两本书给我的直观的阅读感受就是非常朴实但很渊雅,她们都是从材料出发得出结论的。下面我再简单谈三点。

首先,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传统的问题,张老师是从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利维斯(F.R.Leavis)的角度去谈传统的,所以在张老

师的这本书里面,传统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这是给我们启发最多的一个点。而且张老师也像古代人写章回小说一样草蛇灰线,她钩沉了很多踪迹,比方说以“陆沉”为代表的一系列概念。

其次,我的个人感受是,章回小说是现代文学的潜意识。从前你多么急迫地压抑它,到最后它就会多么大规模地重返。我最近也在写一篇关于张爱玲的论文,我想写的是她怎样在美国重新发现了章回小说的阐释潜力,帮助她克服了现代文学写作的很多障碍。

最后,阅读张老师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章回小说作为一种形式体制足够具有能量。包括曲波的《林海雪原》这些作品,虽然外壳不是一部章回小说,但内里依然是章回小说。所以章回小说作为一种形式体制,我觉得是恒久的,甚至是历久弥新的。

### 三、“从传统到现在”

张蕾(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这场论坛是王尧老师建议发起的,题目在今年暑假开始酝酿。“从传统到现在”,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包容性”,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从传统到现在”这个议题,我想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当下,都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北京大学王瑶教授撰写《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等文章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现当代文学学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方锡德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陈平原教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则开始系统、具体地研究这一问题。

最近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黑神话:悟空》就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在”的一个例子。它把传统小说《西游记》变形为游戏的形式,既是《西游记》的“后传”,同时又充分融合了当下信息技术与赛博时代的经验特征。十分有意思的是,《西游记》这部书原本就是一部游戏之作,最早

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胡适。胡适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sup>①</sup>鲁迅呼应了胡适的观点，指出：“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sup>②</sup>这切合普通人读《西游记》的心理感受，也道出了作家写通俗小说的初衷。

《西游记》的可爱之处吸引了学者胡适，以致胡适重写了《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胡适对《西游记》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不满意，认为“太寒伧”，于是改作为“观音点簿添一难 唐僧割肉度群魔”，叙述唐僧师徒从云端落下，进到三兽塔。唐僧在塔里打坐入定，取经路上被打死的妖魔鬼怪都来索命，唐僧割肉以飨鬼魂，完成最后一难。“唐僧把身上割得下的肉都割剔下来了，看看只剩得一个头颅，一只右手还不曾开割。说也奇怪，唐僧看见这几万饿鬼吃得起劲，嚼得有味，他心里只觉得快活，毫不觉得痛苦。”<sup>③</sup>我读这个“唐僧割肉度群魔”的故事，感觉不就是当下的“黑神话”吗？

举《西游记》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传统文学与文化对现当代的滋养是无所不在的。我对于古典章回小说的研究，主要目的就在于考察传统如何进入现代，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有哪些有章可循的文本可以让我们不断阅读与反思。同时我想通过这一研究突破已有的雅俗文学研究分界的理路。在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方面，范伯群教授筚路蓝缕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卓著成就，他为现代文学找回了“另一只翅膀”，并得到了学界的完全认可、接受和运用。我想继续做的工作，是沟通雅俗，突破在通俗文学范域中进行的的研究。

这个想法从我写的第一本小书《“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研究》就开始了，这本书主要考察了从古代到现代，章回小说的一种特殊的文体结构，即“故事集缀”，这种结构背后显示的是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群氓的时代》、伊罗生

(Harold R. Isaacs)《群氓之族》等书中所阐述的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和现象。我联系现代作家采用“故事集缀”的小说结构及写法，努力对这一问题作了文学上的讨论。接着《章回体小说的现代历程》主要考察在现代语境中的章回小说文体如何继续被写作、讨论和发生变革。这本书主要采用了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中系统阐述了“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史观。以往历史学家把历史看成具有时间因果联系的科学，而斯宾格勒把历史看成“文化形态”，由心灵和表现形式构成的形态研究是20世纪史学面临的重大课题。斯宾格勒之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著的《历史研究》一书继续深化了文化形态学理论。这种史观和方法论，在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运用。考虑到现代章回小说身处新的生存境遇，形态学方法恰好能把握章回小说本身及其各种表现形式或表象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历史的复杂情境中透视出小说本体的“心灵”律动。《传统的踪迹》是这些思考和研究的继续推展，我希望能够比较清楚地考辨传统如何在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创作与生活中留下它的印迹。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再现永远不会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继承者中才赋最佳者对前驱巨擘实施的竞争性的误释”，“影响的焦虑”是牢牢“扎根于一切文学想象的基础”。<sup>④</sup>

刘祥安(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首先,我要再次强调形态史观,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楚辞、汉赋以及近体诗、词、曲等,都有它们独特的形态。形态自身有其萌发、生长、发展、繁荣、

① 胡适:《〈西游记〉考证》,《胡适文存》第2集第4卷,第105-10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按,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③ 胡适:《〈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胡适文存》第4集第3卷,第303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

④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第15、1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解体和消散的过程,此形态与彼形态之间冲击、推挤、影响有之,发展、进化未必有之。明清以来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种形态,它有明确的萌发、生长、发展、繁荣的过程,至于解体、消散似乎一直研究不多。张蕾教授的研究揭示了章回小说在现代小说形态冲击下演化、变形的历史过程,对于章回小说这一叙事文学形态的总体认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

其次,该著对章回小说的古今变化进行了深入肌理的分析。现代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西方理论,而“市井”一词或许更符合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市井的人生在通俗文学、章回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市井小民的情感方式、感知方式和章回小说的叙事机制有内在的关联,揭示市井的感觉方式、情感形式的往往不是在新文学,而是在通俗小说、章回小说当中。因此,从市井情感结构的角度、感觉结构的角度研究市井社会与通俗文学、章回小说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助于我们体认小说中国,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最后,现今被视为显学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问题,正值得深入探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首重文化建设,现在讲传统也事关文化建设。但传统是个庞大的概念,难以确切讨论。我欲将传统问题转换为一个个具体的句子,在此基础上可作切实的讨论:传统是什么(我们从

历史中发明什么并谓之曰传统)?谁在追寻?谁需要?……谈论小说传统时同样需要这样的具体追问。

对于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见证了我们学科的成长与发展,目睹了前辈们的卓越贡献,以及南北方学者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非常感恩。最后再次感谢各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典章回小说承继下的现代通俗小说形态研究”(13CZW07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12—1917 中国文学史料开掘与阐释研究”(20BZW1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尧,苏州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高远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研究中心副主任;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中文学刊》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房伟,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蕾,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等等。